

史诗演唱与



SINGING AND THEORIES
OF EPICS

A BRIEF HISTORY OF EPICS
FROM ARISTOTLE TO LORD

傲东白力格 / 著

史诗理论

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学简史

赫尔墨斯在洞府中没有看见奥德修斯，
后者正坐在波浪滚滚的大海岸边，
遥望着故乡的方向，心情悲愁，泪珠滚滚。
女神中的佼佼者，卡吕普索将赫尔墨斯引向
舒适的宽椅，然后问道：
尊贵的执金杖的赫尔墨斯，今天大驾光临，
不知有何贵干？您可是位稀客。
您尽管提出您的要求，只要我能办得到，一定鼎力相助。
请进来坐坐吧。我要好好地招待你。

——（奥德赛）

013048589

I106.2
46

史诗演唱与



SINGING AND THEORIES OF EPICS

A BRIEF HISTORY OF EPICS
FROM ARISTOTLE TO LORD

傲东白力格 / 著



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学简史

史诗理论



北航

C1656658

I106.2
46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史诗演唱与史诗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学简史/ 敖东白力格著. —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5527-0012-1

I. ①史… II. ①敖… III. ①史诗—诗歌理论—研究—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4940号

史诗演唱与史诗理论

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学简史

敖东白力格 著

责任编辑：杨继军

封面设计：马吉庆

出版发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邮 编：730030

电 话：0931-8773224 8773257(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E-mail: gsart@126.com

印 刷：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7.25

插 页：4

字 数：200千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次：1-1000

书 号：ISBN 978-7-5527-0012-1

定 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前 言

本书是以可观察到的中国史诗演唱经验为基础，简要地讨论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洛德的史诗理论。这种史诗理论主要包括语文学史诗理论、结构主义史诗理论和口头程式史诗理论等三种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但是这些史诗理论都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史诗歌手们是如何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的。亚里士多德当年面对古希腊荷马史诗和悲剧的创作与表演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比较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和荷马史诗时发现，它们的创作遵循了两个不同的法则：一个是作者去表述已经完成的行为，另一个是歌手去摹仿可能出现的行为，于是他就提出了虚构作品的有名摹仿理论。这种摹仿理论即使今天研究艺术类口头作品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这种语文学史诗理论认为，歌手们是用某一虚构主人公之行动变化为单位进行构思史诗故事情节的。所以，史诗故事由开头、中间和结尾三部分组成。歌手们口头表演时，他们是以从头到尾的顺序构思和创造史诗作品的。目前，很多史诗学专家就用这种理论范式来分析中国史诗作品或史诗演唱。

但是结构主义史诗理论认为，歌手们口头表演不同的史诗作品时，就重复使用相同的结构成分——母题要素或基本情节类型来生成无数个口头史诗。歌手们在每一次口头表演时，用增减或改变行动变化的顺序等方法来创造和表演不同的口头史诗，从而形成多样的口头史诗世界。这种结构主义史诗理论是从普洛普关于童话故事形态的研究理论中引进来的。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蒙古史诗时都使用这种结构成分分析法，丰富和深化了蒙古史诗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学者海希西和中国学者仁青道尔吉。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开始使用这种结构成分分析方法来研究哈萨克史诗或南方的史诗，拓宽了中国史诗的研究领域。

口头程式史诗理论是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最新的史诗研究范式。美国学者帕里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是一种经常重复出现的程式。后来，他在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时，在口头史诗表演本身中也发现了类似程式，于是称为“口头程式”。所以帕里和洛德认为，荷马史诗的表演者和南斯拉夫的歌手们都是使用已有口头程式来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他们不是即兴表演来完成史诗演唱，也不是背诵文本来完成史诗演唱，而是使用已有的口头程式、主题和故事范型等口头传统来完成自己的史诗演唱。这样，史诗学研究不是史诗演唱活动，而是歌手的史诗演唱能力。这种史诗演唱能力是歌手在完成史诗演唱活动中才能充分体现和被观察到。

这些史诗理论都是关于歌手们如何完成史诗演唱的解释理论。我们把这些史诗理论放在一起时，我们几乎本能地发现，

这些史诗理论范式或研究纲领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那么，哪一种史诗理论或分析工具更有解释力，这就看这些史诗理论能否清晰地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史诗演唱经验数据。所以我用大家可观察到的中国口头史诗经验为基础，讨论和描述西方的三种史诗理论。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史诗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和分析方法。

目前，口头程式理论经过洛德和弗里的研究与开拓，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史诗理论。洛德和弗里都很重视口头表演和口头传统，但是他们的表演理论与鲍曼表演理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引入鲍曼的表演理论时，明确地区别表述性表演与摹仿性表演，以此解释艺术类口头作品与非艺术类口头作品的区别，突出艺术类口头作品的虚构特点。这个虚构特点在鲍曼的表演理论中被忽略，我们重新强调口头史诗的虚构特点。这正好对应弗里对口头传统研究发展趋势的预期：“最后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我认为是对口头传统文本的审美方面兴趣的增长。现在众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在谈论程式和主题的结构时，不应当排斥谈论语言的艺术性。”这种观点又让我们回归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摹仿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等都是通过描述主人公的行动变化来摹仿我们的可能存在。所以，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讨论一种可检验的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否用大家可观察到的藏族的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戏剧本身的田野经验来检验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命题及其细节。这不仅符合帕里开创的通过口头史诗的田野调查来讨论“荷马问题”的科学研究方法，又突破了把亚里士

多德诗学理论当成唯一教条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重新呈现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本来面目。亚里士多德是根据当时可观察到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悲剧为基础，讨论一种一般意义的诗学理论命题。经过几千年，我们又找到了这个科学研究方法。有了这种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经验来检验史诗理论的可检验的原则，世界各地的史诗专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熟悉的或调查到的口头史诗和口头戏剧材料来重现修正、丰富和发展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民俗学专业的几届硕士研究生，尤其是我第一次上史诗学概论课程的 2003 级的撒军等几位同学。从他们认真的听课笔记和充满求知的眼神中可以感觉到史诗学的魅力。这里，我还要感谢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已故的弗里教授，我和他一起于 2010 年 3 月在西宁合作完成的关于神授歌手的田野调查研究，不仅丰富和深化了我的思考，同时也促成本书中“可检验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部分的写作工作，它是这次合作的直接结果。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科学理论的特点	1
二、可证伪的史诗理论	3
三、竞争中的史诗理论	4
四、唱不完的史诗演唱与史诗样本	9
第二章 研究史诗演唱的意义	15
一、作为口头传统的史诗	15
二、作为文学资源的史诗	19
三、作为人生启示的史诗	25
第三章 关于史诗演唱的种种看法	29
一、史诗专著与史诗法则	29
二、书面史诗与史诗法则	29
三、史诗演唱与史诗法则	31
四、史诗评价与史诗法则	32
五、史诗歌手与史诗法则	32

六、书面史诗与口头诗史	33
第四章 描述性史诗法则	35
一、这首口头史诗演唱就是诗史演唱的全部	35
二、史诗演唱能力与口头叙事句法	37
三、史诗演唱的三种口头叙事法则：顺序法则、结构法则 和程式法则	39
四、规定性规则与描写性规则	41
五、史诗法则所描写的对象	43
第五章 史诗的口头内容与口头形式	45
一、关于口头史诗的“历史内容分析”	45
二、关于口头史诗的“文化内涵的分析”	46
三、关于口头史诗的“历史时间的分析”	46
第六章 语文学史诗理论	49
一、摹仿	49
二、故事情节	59
三、角色类型	69
四、这一首史诗、诗章和子情节	78
五、叙事范畴——人称、视角和时间	89
第七章 结构主义的史诗理论	99
一、这一首史诗的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	99
二、语文学史诗理论与结构主义史诗理论的主要区别	102
三、母题分析	103
四、母题系列分析	107

第八章 口头程式史诗理论	112
一、帕里的学术贡献	113
二、口头程式概念与蒙古史诗	120
三、洛德：站在巨人肩上	122
四、主题、主题群或故事范型	127
第九章 可检验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	136
一、摹仿表演：口头艺人的工作	137
二、格萨尔演唱与藏戏表演的比较	145
三、格萨尔演唱的几个特点	153
附录 史诗欣赏	
阿拜·格斯尔（第一章）	163

第一章 导论

一、科学理论的特点

科学理论既不是空洞的解释体系，也不是特殊经验的概括，它是大家可观察到的事实为根据构建起来的一种解释体系。作为科学的史诗理论也是一样的，它是以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一种史诗理论的解释体系。所以，我们讨论各种史诗理论及其发展轨道时，必须通过观察具体的史诗演唱为依据来讨论这些史诗理论。

以往，很多中国的研究者，虽然口头上喊着自己如何做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很少专门注意科学理论的特点，更谈不上系统地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则。大家总是脱离中国的实际、脱离可观察到的客观事实而做所谓科学研究。结果，他们要么充当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要么充当所谓“中国经验”的阐释者。只有少数的中国学者才真正地遵循科学研究的基本法则。他们根据大家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为基础从事他们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中，费孝通、杜赞奇、林毅夫、蔡华等学者是这样的少数的人文学者，他们是根据中国事实本身来研究关于中国事实的科学理论，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中国派的科学理论。费孝通先生在晚年非常准确地总结出这一学派的特点：他们走的是一种不唯书不唯上，只求“从实求知”的路子。

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走的是另一条路子，他们不怎么重视客观事实，从而脱离观察到的客观事实而做科学研究，其结果，他们不得不选择一种从书本求知的路子或阐释中国经验的路子，于是他们成为书本西方理论的“搬运工”和中国经验的阐释者。前者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者，在西方理论中出现什么理论，他们就做什么研究。

如果有人反对某一些西方理论，他就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认为异想天开，这就是搬运派的教条思想在作怪；后者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经验主义者。他们想建立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科学理论，试图超越一切人类思想和学术遗产。这种科学理论试图基于中国独特的文化或价值观建构一种独特的“中国理论”。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他们否认了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和可积累性的特征。在当代中国语言学家和民间故事学家当中这种观点普遍存在。比如，祁连休在他的专著《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中试图在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全新的故事类型分类方法。

当他们的这些想法变成学术行动的时候，教条主义者很容易变成一种科学机会主义，他们在西方流行什么新理论，就马上应用这些新理论来解释在中国观察到的各种经验现象；而经验主义者很容易变成一种科学的冒险主义者。他们用与西方不同的全新“中国科学理论”来解释和阐释中国古代的或中国当代的某些经验现象。他们是忘记了或人为地忽略科学理论的普遍性特征。

实际上，一切科学研究是大家都可观察到的以事实为根据构造出来的理论解释体系，这些经验事实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可以观察到的。所以，科学理论的解释能力或解释结果——大家根据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来检验或修正。如果离开了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那么我们大家谈论的科学研究或理论解释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动，任意讨论，就会失去它的客观和公正。

古希腊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科学家与数学家。他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是历史学家拉尔修记录了几行据说是他的诗句：“多说话并不表示心里理解，去寻找唯一的智慧吧，去选择唯一的善吧，这样你就会钳住唠叨不休的舌头。”这里的“智慧”和“善”，我们可以理解为客观和公正。真正的科学理论是符合人性的，对于每个人都一样客观和公正。大家根据可观察到的局部的可重复的事实中获得关于整体性质的理论解释。

科学理论不仅是解释各种事件是如何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而且这些结论，可以预言新的经验事实。所以，科学理论还有可检验的特征。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这些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来检验各种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解释还可以预言新的经验事实。普遍性、可观察性和可预言性，就是任何科学理论的三大特征。

我们的史诗理论只有具备这三个特征时，它才是比较成熟的，或者是符合科学规范的史诗理论。

二、可证伪的史诗理论

史诗理论不是孤立存在的。我们把所有的史诗理论放在一边，而另外一处——如果还没有形成任何理论解释，那么我们看到的只是口头史诗歌手的史诗演唱活动。假如后来出现两种或几种关于这些史诗演唱本身的解释理论，这样，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解释理论中哪个是更符合史诗演唱本身的事实呢？如果大家想评价已有的这些史诗理论解释中那一种解释理论是更正确的或者更科学的问题，他们只能选择——从实求知这个“唯一的善”，“这样你就会钳住唠叨不休的舌头”。因为，这些史诗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只能由史诗演唱本身的经验事实来判决，也就是大家用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中的经验事实来检验这些史诗理论解释的合理性。一种理论越是符合史诗演唱本身的经验事实——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越高，相反，一种理论越是不符合史诗演唱本身的经验事实，这种理论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越低。如果没有这样的可检验的环节，我们把这个理论就不叫科学理论，我们就不能“钳住唠叨不休的舌头”。

这样，各种史诗理论之间产生强烈的竞争，并不断地进步，不断地发展。美国哲学家蒯因有句名言：“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的，而是仅仅作为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蒯因，1987：59）同样，我们把史诗理论放在一起，当成为一个整体对象的时候，这些史诗理论才能接受史诗演唱中的经验事实法庭的检验，

这样的史诗理论也是一种科学理论，可证伪的史诗理论。

这种整体对象中，各种史诗理论成为一种相互竞争的解釋体系。这种竞争关系就是一种理论结构。孤立的一个理论是没有结构的，也没有竞争；没有比较，也没有修正和进步。所以，我们讲的史诗理论是一种可检验的可证伪的，由各种史诗理论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体系。我们这里主要介绍的就是这些史诗理论及其演化轨迹。

三、竞争中的史诗理论

我们把所有的史诗理论放在一起时，对我们而言它成为一个整体结构体系，而且这个整体面对的是所有的可能的或已有的史诗演唱这个现实环境。这时我们考虑的就是这种史诗理论是否拟合于这个史诗演唱（现实环境），若是拟合史诗演唱环境，那么这种理论是正确的；若不符合史诗演唱环境，那么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这也符合波普的科学理论的可证伪原则。波普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波普，1986：52）

我们根据这些史诗理论拟合于我们史诗演唱经验本身的程度来鉴别和评估现有的任何一个史诗理论的解释能力。我们根据已有史诗理论拟合于可观察到现实生活中的史诗演唱经验的程度，获得了史诗理论的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是由诸多史诗解释理论与史诗演唱经验关系入手总结出来的。我们从各种解释理论之间的竞争关系入手，把相互之间相似的史诗理论解释归为一类；而相互之间不相似的史诗理论解释归为另一类。这时现有的史诗理论可以总结为三个理论范式，即语文学史诗理论、结构主义史诗理论和口头程式史诗理论。每一种史诗理论都是建立在前面的理论的基础上，并且以某一种方式涵盖前一种史诗理论的精华。从这个角度看史诗理论不是个人的遗产，而是大家的财富。每一种史诗理论的解释能力之间有一种逐步增加的一种进化关系，这也表示史诗理论是可积累和进化的。

各种史诗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对象时，它才接受史诗演唱经验的检

验和审判，而这种史诗理论整体中的各种理论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它们的解释能力是有一定差异，有的史诗理论解释比其他史诗理论解释更合理，更具有解释性。所以，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史诗演唱中经验事实，我们就可以公正地评估究竟哪一种理论更合理，更科学或更优越。解释力较弱的或者发育不太好的理论可能被逐渐淘汰，当然这些已淘汰的史诗理论的影响不会马上消失，甚至存在很长时间。

我们把大家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中经验事实——江格尔奇、格萨尔仲肯、玛纳斯奇、荷马等“史诗歌手是如何工作的”作为客观事实——作为评价史诗理论解释力的唯一尺度时，我们可以根据亚里士多德主义、结构主义和口头传统理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获得三种史诗理论范式。这就是上面说的语文学史诗理论、结构主义史诗理论和口头程式史诗理论。第一种是语文学史诗理论范式，也可以叫传统的史诗理论；第二种是结构主义史诗理论范式；第三种是口头程式史诗理论范式。

语文学史诗理论范式或传统的史诗理论认为，史诗演唱是大家按着从头到尾的记忆顺序来完成的故事情节。不同的史诗演唱就是不同的故事情节的记忆顺序。所以，要准确地记录一首口头史诗，必须从多次完成的记忆顺序中挑出故事情节最丰富的，或者多人完成的记忆顺序综合为一个完美的故事情节，把它确定为一首口头史诗。

于是把他们不同的记忆顺序的史诗演唱合成为一个比较典型的或完整的“史诗版本”。但是仍然有些口头史诗是不能合成或加工的，它本身是非常完美的一次口头表演。这样就导致了口头史诗是集体创造的（合成的）还是个人一次完成的这一争论。有的人认为是荷马一个人完成的，而有的人认为是几代人集体完成的。所以，大家对荷马史诗的创造过程一直在争论。（弗里，1988）

第二种是结构主义史诗理论。他们认为史诗的故事情节不仅是记忆顺序来完成的，它也有层次或结构关系。不同的史诗演唱的故事情

节之间有聚合关系，这种聚合关系构成了史诗的故事情节中的抽象结构或“母题系列”。这样，史诗演唱过程不仅仅是记忆顺序来完成的史诗演唱，其中，聚合结构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聚合结构的最小的构成单位就是“母题”。于是还出现了“母题群”、“母题系列”等概念。母题结构类型概念是德国蒙古学者瓦尔特·海希西（Walther Heissig）根据世界各地的蒙古史诗材料第一次提出来。（海希西，1983：352）

这种史诗理论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抽象结构与具体作品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很像柏拉图的具体的桌子与它的一般“理念”之间的关系。那么，口头史诗是潜在的与现实的？抽象结构是可能与现成的？这是他们无法回答的理论难题。

第三种是口头程式史诗理论。他们认为史诗演唱既不是记忆顺序来完成的，也不是固定“结构指令”来完成的，而是使用现成的程式来口头表演的。结构主义史诗理论虽然解释了已有史诗演唱中的各种口头史诗之间的聚合关系，但是他们无法解释口头史诗中的插入成分——子情节。这些具体子情节与抽象结构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在一个母题系列中体现出来的，这些子情节在史诗演唱中可以插入、增加、减少和转移，它是一种转换关系。结构主义的母题系列概念，是无法解释史诗演唱中这些子情节的插入、增加、减少和转移等转换关系。但是，在口头程式理论中，它是非常自然地成为一种程式的口头表演，因为每一次口头表演都是唯一的，它是一次有效的口头创造，而不是重复制作。每一次演唱都有其自身一位“作者”。（洛德，2004：147）子情节本质上是口头创造中的一种主题排列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一主题或典型场景的插入、增加、减少和转移来解释子情节的出现或不出现。

口头程式理论是试图解答荷马史诗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而出现的。语文学家试图彻底解决这个“荷马问题”时遇到了一个困难，那就是无法访问死人。于是他们把注意力转向现实生活中史诗演

唱经验本身。哈佛大学古典文学的助教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35年去南斯拉夫进行田野调查，并考查了南斯拉夫“故事的歌手”表演过程的各个方面。后来成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创始人。他和洛德专门去考察这些“活着的荷马”是究竟如何完成他的史诗演唱的。帕里在这些“活着荷马”的口头表演过程中获得启发——验证了他在早些时候提出的口头程式假设。

这样，我们第一次彻底分开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和所讨论的史诗理论，并且根据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来讨论史诗理论成为可能。这个贡献归功于帕里。他的贡献好比伽利略奠定现代力学的基础一样，为现代史诗理论或口头传统理论奠定了全新的经验基础。于是出现了真正的科学的史诗理论。实际上，结构的史诗理论也是根据可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讨论史诗理论。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区别——口头史诗和文本史诗。所以，他们混淆两者，根据一些文本史诗为根据去讨论史诗理论。用文字记录成的文本史诗，只是史诗演唱的文本脚本，它是口头史诗的衍生物，它比口头表演本身简单得多，损失了很多信息。结构主义史诗理论，虽然根据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中经验的聚合关系，但是没有把口头表演本身放在第一位。对于结构主义史诗理论来说，史实演唱仍然是次要的，但是对于口头程式理论来说，史实演唱本身是第一位的，而对它的文字记录反而是次要的。所以，结构主义史诗理论无法根据可观察到的史诗演唱本身来讨论史诗理论。

我们可以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行动的摹仿理论”图式为基础，说明三种史诗理论范式及其它它们之间的递进关系。

（一）语文学史诗理论：史诗“主人公——行动”的故事情节是一种由记忆顺序分别完成的史诗演唱过程，但是每一次可合成为一个更完美的故事情节。这种语文学的史诗理论从古希腊延续到现在，目前，中国的很多史诗学者仍然在使用这种理论范式。摹仿理论是亚里士多德语文学史诗理论的精华所在。（亚里士多德，1999：